

一座名城的革命运动史 一所村庄的百年变迁史

一位母亲的人生苦难史 一个游子的青春心灵史

穿越苍茫的革命叙事 洞悉命运的世象写真

黄安·红安

李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HUANAN
HONGAN

黄安·红安

李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安·红安 / 李骏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033-2608-0

I. ①黄…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7802号

黄安·红安

作 者: 李 骏

责任编辑: 丁晓平

封面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bcs@126.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460千字

印 张: 27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608-0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这是一个时代的喜怒哀乐，
也是一个家族的爱恨情仇。
这是一位母亲的离合悲欢，
也是一位游子的苦辣酸甜。

——谨以此书，献给我长眠于红安故乡山川那多难多灾的母亲，以及她死去的亲人们，愿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不再流泪，灵魂安息。

同时，也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那块生长将军的黄安热土，以及像母亲一样曾多难多灾的故乡人民，愿他们在今世里能够飞黄腾达，幸福安宁。

目 录

引 子	无处安放的灵魂	1
第 一 章	革命来了	3
第 二 章	缄默的殉道者	23
第 三 章	不期而至的哀伤	43
第 四 章	无限接近的幸福	70
第 五 章	运动来了	95
第 六 章	梅雨悠长的季节	115
第 七 章	秋天的挽歌	134
第 八 章	荒原上的舞蹈	156
第 九 章	落地的尘埃	187
第 十 章	摇晃的童年	201
第十一章	敲响希望的钟声	225
第十二章	现世报	239
第十三章	何处是归程	254
第十四章	飘逝的迷雾	266
第十五章	向下生长的枝条	292
第十六章	逆行而上的河流	329
第十七章	逃遁与归宿	344
第十八章	无法把持的命运	364
第十九章	永远的飘落	377
第二十章	失落的故乡	394
尾 声	远离稼穡的江湖	412

引子 无处安放的灵魂

一晃,许许多多活生生的生命,从身边走了。他们像云一样飘过,像山一样沉默,像水一样无踪。

而我无数次会想起他们。在白天行走的路上,在黑夜沉沉的梦里,在悲伤的时刻,在喧哗的瞬间,在失败的忧伤里,在成功的寂寞中。

他们,头顶草屑,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让我无数次想起他们。

想起他们,我便想记下他们活着时曾经历的一切。

我写过无数个人,看淡过无数人的心,阅读过无数人的眼,穿越过无数人的身边,我发现,惟有他们,会永远在心头上坐着。

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写他们呢?因为他们过于熟悉?还是因为他们太过卑微?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写。不讲任何技巧地写,不顾一切局限地写,写下他们经历过的、遗忘过的、高兴过的、悲伤过的那一切。

是的。作为我们那个家族诞生的第一位作家,是该写写他们。故乡出了两百多个将军,将星闪耀,常被老一辈的人津津乐道,不在乎再多我一个。我仅想做一个记录者,记录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故事。我常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两百多个将军的故乡所有的离合悲欢,如风往事,伟大事业,辉煌人生,生离死别,神奇经历,会像轻烟一样飘逝,最后消于无形。

消失的当然不只有轻烟,还有生命。无数个鲜活的生命,像一秋草木,归于泥土,甚至没有人去体味过他们活着的价值。

在我眼里,今天的本吴庄渐渐老了,衰落的村庄人烟逐渐稀少。回去一次,我便叹息一回。往前一点看,早年参加革命的那一拨都没有回来,他们不是战死在异地他乡,都是胜利后到城市当了官,本吴庄人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但他们陌生下去了,也不再回来了。往较前一点看,年青的一代通过没有多少人性的高考,终于考出去了,脱离了土地成为城市居民,虽然大多不过是过着小市民的生活,但在故乡人的眼里,他们是有本事的一群,不像今天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到;而现在,稍微有点知识的或者有点体力的,再或根本什么也没有的,只要年

轻，双腿能动，都跑到城市打工去了，一年也难得回来几次。只有像父亲那样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还在本吴庄的乡村岁月中坚守希望，但一部分人开始老掉牙了，一部分人悄悄地入土了，一部分人早已化作了大山的骨骼。我母亲现在便躺在这最后一部分人中间，发誓到了另外那个世界不再与其中的一些人来往——可怜的她，一生受了多少气啊。

人没有累死的，只有气死的。我母亲说。我母亲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我还听到她对这个世界发出最后一声悠长的叹息。

那声叹息，曾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无论我走到哪里，走了多远，都不曾甩脱。

一转眼，我已浑浑噩噩的拥抱四十岁，到了不惑之年。人生过了一大半，如果一个知情者不写，还会有谁写呢？现在的年轻人，许多已与历史断裂甚至决裂，讲究一切“向钱看”和“向前看”，历史与他们相隔遥遥。我写他们，也不是要向历史交代，而是因为这些人物，虽然大都与我乡里乡亲，即使有的不曾与我沾亲带故，但随着母亲一走，他们从此与我相隔遥远，有的再也了无干系。我从他们中间挣脱出来，坷坷坎坎，波波折折像狼一样嗥叫着，奋斗到了今天的大城市，日子不是大富大贵，也算平顺滋润，应该相当的满足。我的生活中很少再出现故乡的人们，随着母亲的离去，本吴庄渐渐没有我的亲人了，他们还在按原来的方式和习惯生活。但我不写，他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以后即使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的苦乐哀愁，以及内心深处埋藏了一辈子甚至永生永世的秘密。

我把这种秘密叫做乡愁。

第一章 革命来了

I

就从村庄的名字开始吧。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叫本吴庄，位于大别山下的黄安县里。虽然黄安县在今天成为人所共知的红安县，成为人们眼里盛产将军的摇篮，但本吴庄却像每个人记忆中生长的村镇一样，它散落在中国广袤的山坳里，看上去可有可无。如果不是四季的炊烟萦绕，人呼牛哞，很可能这个村庄就像一条没人疼爱的小狗，生时寂寞无边，死也无人问起。

严格上讲，本吴庄算不上是一个小镇，因为它比较小，而且深陷山谷。我长大后学会的第一个成语叫“门对青山”，觉得就是为这个村庄准备的。村庄坐北朝南，泥砖黑瓦，茅草围绕，土坯林立。惟一点缀的是山头上没有边际的松树，一年四季常青；还有春天一到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得像燃烧的火一样，灼痛人眼。本吴庄多数人家屋子的大门在建造时要倾斜一个角度，那是祖上历史遗传，也是风水先生的杰作——他们一般皆是云游过客，拿着罗盘，点着水烟，神秘清高，嘴上还留有长胡子。本吴庄的人不留长头发和长胡子，因为清朝完蛋后，本吴庄山高水远，最后一批成为短发。一个裹过脚的老太太，看到不满意的人和事，开口闭口就是“你这个娼妈养的”，而隔壁的一个学过子曰诗云的老头，却动辄拉过小孩子们的手，要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手里，常常拿着一本黑得像他房屋一样的小书——那是我见过最早的书了。

本吴庄的房子全是黑色的，这并不象征着土壤的肥沃，而是习惯使然。这里不像北方那样烧煤和天然气，人们长年累月烧的是柴火，一年四季飘出的黑烟，早把屋子都熏黑了，所以老人们患眼病的多。

本吴庄的夏天很热。男人们常常是光着上身，穿件短裤走村串户，女人们拿着扇子，摇来摇去，戴乳罩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事。一到夏夜，人们便拽了椅子，点着艾蒿，坐在门口乘凉。艾蒿的烟雾一股股飘起，流窜的蚊子熏得哭爹喊

娘，远远地逃到田野和草丛中悲伤去了。而进入冬天，本吴庄却冷得让人掉牙，这里不像北方有暖气，寒风刮过，屋里屋外一样清冷，导致本吴庄得肺结核病死去的人不可胜数。我小时还得过痢痢，满头白一块花一块的，以至于村庄里有个叔伯伯老叫我外号“痢痢”。我从小便有了本吴庄人身上流传下来的面子观与虚荣心，听后当然很生气，老是不理他。当年他最大的杰作，便是把一头公猪劊了，用小刀割得公猪满地叫，最后急中在他腿上咬了一口，留了腿病，长大后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常跟在他屁股后笑他。他生气地撵来，抓住我了便饱打一顿，没有抓住则气得乱骂。

其实，头上长痢痢这种病在我们本吴庄那时相当普遍。头上长包包，身上长坨坨，似乎并不引人注意。小时全庄连饭都没得吃，病算个什么事呢？我们那里原来吃的盐，都是大颗粒，由于缺少碘，所以许多人得了大脖子病。常读子曰诗云的黑叔叔，便是天天吊着一个大脖子，走到哪里都有小孩跟着，笑他。他急红眼，也像小脚女人那样骂一句“娼妈养的”，还动手打人。他多次上医院去，想割掉算了。但医药费那么贵，他舍不得，所以还是吊着这个肉坨坨生活了一辈子。所幸后来政府在消灭血吸虫时，顺带着也彻底地让人们吃上了精细盐，让本吴庄人过上了老一辈人所说的“科学生活”。我们小时不懂科学，村庄反正很穷，人们讲不了科学。许多人饭前也不洗手，不是水贵，而是没有时间或者懒的缘故，再说干农活要紧啊。更有甚者，吃到中途遇上内急，还会端着碗上厕所，把碗就搁在厕所顶的石条上，拉完了出来接着吃。本吴庄人拉屎时大多数人没有纸擦，因为手纸太贵。于是人们从边上杂树的枝头上扯一把绿叶揩屁股完事。最受欢迎的一种植物叫牛筋树，叶子较柔软，揩时比较舒服。还有的人，拉屎完事后找不到叶子，甚至还用石头和瓦片揩，让人觉得屁股真不值钱。

本吴庄原来只有一个姓，与我一样都姓李。但我上小学时突然搬来了一群人，都姓邓。打头的叫邓有治，后来当了我们村的队长，打破了李姓一统村庄几百年的规律。我们李姓人家，虽然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属于同一个树根，但后来根系又渐渐分权，慢慢分为三块：一块是东头的，这是一群参加革命比较集中的人群。他们解放后在这个村庄占领了说话权，大事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定。主要原因是他们这个根系上冒出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太太赵春玲，而她起家的原因是因为自家的老头参加了革命，牺牲后评上了烈士，解放后她便在村庄一言九鼎。西边的一块，情况比较复杂，他们这个根系上生长的人群，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后来还跑到海外去了。革命胜利后划分阶级成分，这一块各家各户即使也有革命的底气，但多数人还基本上得忍气吞声。到了我们南边这一块，做生意的与种田的各占一半，当然也有一部分参加共产党跑出去革命的，可非常奇怪的是，革命胜利后我们这一块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也没

有一家能评上烈士，算是属于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着微薄的希望。而像我爷爷李成和这样既支援过革命，又靠自己劳动和精打细算，最后积下多亩田地的，解放后却被东头的革命老太太赵春玲划上了阶级成分，不是中农就是富农，因此也是一辈子没有抬起头来。

本吴庄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北边的那块地靠山，后来给了搬迁户。按说搬迁户一般要在异乡站住脚是非常困难的，但搬迁户邓有治家的弟兄多，所以在村庄里也没受到什么欺侮。强者生存这个道理，适合于我们本吴庄的自然法则。再说他们来得也比较晚，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已进入70年代中后期了。那时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各干各的，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一个个忙得要命，村庄打闹吵架的现象少多了。

我长大上学后，有人问我：“本吴庄本来应该姓吴的，怎么会姓李呢？”我答不上，回去问我父亲。父亲正在干农活，我的话音刚落，他便一个耳光飞来了。当时我躲闪不及，脸上便重重地挨了一下，那个鲜红的掌印一般要保留好几天。我父亲不喜欢我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更喜欢我去打猪草，或者去山上多砍一担柴火烧。父亲一字不识，他回答我的总是耳光，这件事千篇一律，全村人都知道。我总是吓得抱头鼠窜，逃之夭夭。长大后我总结了一下，如果自己还有一点聪明才智，是与父亲在反复抗衡中学到的，人在强大的势力面前，如果不能选择面对面的反抗，总得绞尽脑汁，找点东西学会逃避。我是在父亲严厉的耳光与目光中成长的，因此身上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当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叛逆，与父亲就在埋下仇恨的种子中共生共长。直到我长大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进城市，后来有了儿子，他不听话而我忍不住想揍他时，我从他眼里看到了那股隐藏的愤怒与不屑，于是我有些不寒而栗，仿佛看到了自己童年的某个深夜，我拿着刀想架在父亲脖子上的神情。因此，打儿子的想法便跑得无踪无影。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与我爷爷的性格也是这样的，这便注定了—一个家族的命运。我相信血缘关系总是在遗传变异的同时，还是保留了某种神秘的东西。

当然，一个姓氏在今天有奶便是娘的年代可能算不了什么，谁有钱跟谁姓并不是怪事，甚至有些人什么也不为，既不跟母姓，也不从父姓，单纯是个爱好。但在本吴庄，姓氏至今还是个大事。一个人要跟母姓，那还了得，肯定要被村庄的头面人物骂得狗血淋头的。说来说去，本吴庄原来是姓吴的，吴姓厉害啊，“一口吞天下”。但好像自然规律，过则转衰，富不过三代。按老辈人的说法，阳气太盛了，必然会突然转阴，折杀生命的。在道光当皇帝时，本吴庄的吴姓遇上一场瘟疫后迅速凋谢。这场瘟疫是先从鸡瘟开始的，鸡瘟迅速传染到好朋友猪的身上。那时人们特别热爱粮食，更何况肉类食品？鸡猪死了，吴姓的人舍不得扔掉，以为凡是开水煮过的东西吃了没病没毒，因此在吃了瘟鸡和瘟猪肉后，吴姓便迅速

发生了人瘟。瘟疫一来，乡间供的像神仙一样的中草药郎中也没得办法，眼看无论老小青壮人口一个个像绵羊一样倒下，吴姓的族人只好请来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装神弄鬼，唱了一段道，舞了一会儿剑后说：“此地阴气不散，不宜再居。”所以吴姓人家听后便崽卖爷田不心痛，以低价卖了祖地，跑到更南的地方去了。而我们李姓，在当地是个大户，那时正处在人口膨胀与爆炸阶段，族里为土地和盖房子产生的矛盾纠纷很多。一个根系的树上长出不同的植物果实，为争取阳光生长自然要打成一团。所以后来一个分支上的先人，听说吴姓要搬迁，就买了这块地迁来了。

所以，我们李氏家族也是这块土地上的外来户。外来户要打江山，自然是很不容易的。说来也怪，我们李姓迁来后，村庄不仅再未发生过瘟疫，也无更大的天灾，人们一扎根，后代若千苗万树如雨后天春笋，长势凶猛。翻开族谱，还有一个特别令人奇怪的现象是，遇到再强大的外敌，李氏家族也会团结得很紧，没有过不去的沟和坎；而遇到内部矛盾，却往往是输得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一塌糊涂。这就印证了我们革命祖宗的那句话，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2

介绍了基本地情，村庄的故事就会开始。

就从革命的遗孀老太太赵春玲说起吧。在本吴庄老一代人眼里，她是跺一下脚村子便要抖几抖的人物。往远里说，她老公李登高参加革命，至今在我脑里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因为本吴庄我们李姓的参加革命的实在太多，活着回来的人又实在太少。

赵春玲在南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性名字。赵家在我们黄安也是一个大姓。赵春玲从大户人家嫁到本吴庄时，她的爱人李登高还是一个学生娃。

我母亲说，革命胜利前，15岁就结婚在我们黄安县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值得今天的人大惊小怪。何况李登高是本吴庄惟一个跑到武汉那样的大城市里读书的知识分子呢？有文化的人至今仍在我们村庄得到尊重，因此赵春玲的老公李登高自然也是值得叫“先生”的。村庄里的人，当时都称他为“李先生”。

老一代人说，李先生是一个非常文静的人。他看上去皮肤白皙，纤秀文弱，仿佛一阵风就可以将他吹倒。

可有一天，从外面传来的风吹到本吴庄说：李登高参加革命了！

这真是一个骇人的消息。

李登高这么文静的人参加了革命，在我们的村庄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过

去的人们，只读圣贤之书，做谦谦君子，与革命毫无关系。大家都知道，革命是要杀头的！辛亥革命那年，我们李姓几个子弟在武汉参加黄兴的革命，不仅把自己的头丢了，而且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牵连，最后是大家一起凑钱才保住了家族平安。所以，从那以后，在本吴庄这一片大好的土地上，有钱人才读书，读书是为了更有钱，这个观念至今在我们那里根深蒂固。除了今天——今天本吴庄的年轻人全都读到小学初中就不读了，一蜂窝地跑到城市里打工，一月挣个千儿八百的便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什么事呀！

1927年的黄安本吴庄，读书为了做官，天经地义。但读了大书的李先生，却偏偏迷恋上革命，这让他的父亲非常不解，非常愤怒。他的父亲李有德为此常常到我的曾祖父李光天那里诉苦，说养子不孝，大逆不道。

他叹息着说：“原想一个葫芦结天那么大，谁知连个酒勾（黄安方言，打酒的器具）都指望不了！”

我的曾祖父李光天听后先是沉默，后来也是回应一声叹息。

那时，李光天虽然家大业大，可自己也忙不过来呢。他的两个儿子——我爷爷的两个哥哥也在闹革命，要分他的田地家产给穷人呢。

那时我们本吴庄将人群只分为两种人：穷人和富人。不像今天叫干部和老百姓，也不像今天牛逼哄哄的中央台，动不动就说“咱们的老百姓呀，真呀嘛真高兴”，谁高兴呢？中央台没说。你说我们村庄七老八十的老年人高兴吗？他们在年轻人出去打工后，还得带着孙子辈在田地里春耕夏种，没日没夜地劳作，会高兴吗？你说年轻的打工仔高兴吗？他们连土地都不要，甘愿背井离乡，跑到城市里讨生活，看人家的脸色，受人家的剥削，连个正常的性生活都没有，找个便宜的小姐被逮着了一年就白干了，能高兴吗？你说留在乡间的小孩子们能高兴吗？他们在成长的重要过程中，由于父母双双外出，一年四季难得见上一面，偶尔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敢叫了，能高兴吗？你说留在家中拴在土地上的女人们能高兴吗？她们带孩侍老，忙得没有青春的光泽，还极有可能被外出打工的男人抛弃，长年累月的也没有个正常的生活，她们能高兴吗？有时我想打个电话问一下改成大裤衩的中央台，你们在时尚时知道谁在高兴吗？

革命不是这样。革命为了大众的幸福。李先生读了书回来，便告诉自己的父亲，要把田产和粮食分给穷人，这让他父亲非常恼火。

“你反了天了！”李有德说，他气得跳起来。

李登高不急。他慢慢吞吞地说：“连清末秀才董必武都把长辫子剪了，号召大家起来革命，我们为什么不革命？为什么不让大家都有饭吃，都有田种？”

李有德说：“你又不是皇帝，连皇帝也只顾自己，你比皇帝还大呀？”

李登高说：“所以历朝历代人们最后都要反皇帝，不革命肯定是不行的。”

李先生的父亲李有德一听，就整天阴着脸，跑到南边我曾祖父李光天家里诉苦，述说自己家中的大逆不道。

李有德生来爱面子，他之所以屈尊来到我们南边来诉苦，一是因为我曾祖父还算当地名流，二是因为我曾祖父救过他的命。

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我们那一带闹事时，差点把李有德给宰了。我曾祖父仗着自己支持过革命，还给革命者提供过银元的面子，硬是将李有德从刀口下救了回来。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见过我曾祖父李光天的面，哪怕片纸半影的肖像。但后来村庄里的人都说，李光天曾是我们那里极具影响的人物。

我母亲常对我说：“伢呀，你曾祖父是个好人啊。”

然后，母亲亲口对我讲了关于李光天如何好的小事。那些事我从小便一直记在心里，以至于母亲后来老了听我重述时，她特别惊讶于我仍然旺盛的记忆力。

严格说来，李光天是无党无派的，像我今天的性格，不喜欢山头主义，也不喜欢拉帮结派，所以混得马马虎虎。李光天是一个生意人，做生意只讲和气生财。李光天可能认为不与钱过不去就行了，因此不参加任何党派。我母亲说，李光天有一句名言，“参加党派可能随时就会人头落地的，跟钱过得去才会有出路”。所以他一生都很有钱，但又不参加党派。

我母亲讲，李光天在黄安城有当铺和肉铺，而且还有好多家，在黄安也算是个望族。更让人吃惊的是，李光天甚至还开有一家叫“仁义和”的票号，与晋商的票号类似，因为盖有他名字印章的纸钞曾发行到河南的光山、固始，安徽的金寨和湖北的大悟、麻城等好几个县市，成为当地的流通券。

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

我母亲说，李光天虽然有钱，可为人心善，自己有钱，也见不得穷人过苦日子。他最早是靠贩卖生猪发财的，按今天的话说第一桶金是从猪身上得到的，不存在原罪一说。

我母亲说，李光天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如果看到村子里有哪家还买不起猪肉的，就把肉送上门去，完全不提钱的事。这一点比我们今天许多人还要高尚。更为高尚的是，遇上村庄里那些爱脸面的人家，害怕人家拒绝施舍会伤及颜面，李光天一般在晚上就把猪肉挂在这户人家的门上，敲一下门然后就走了。人家一开门，看到猪肉挂着，而见不到人影，也就悄悄地收了。爱面子不是今天我们红安人才有的，所以我们本吴庄人爱面子的习惯，今天还一直保留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举不胜举。

我小时听我母亲讲李光天的事时，常常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下着大雪、刮着大风的夜里，李光天轻轻地把猪肉挂在人家大门上，他轻声地敲着门，然后悄

悄地离开……

这种场景,让顺利进入了21世纪并接受了满脑子现代思想的我,想起来还十分感动。

为什么呢?因为李光天的孙子——我的父亲李禄——在解放多年后,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老实巴交的,年终总是从生产队里算不到现钱,接着分田到户,连我们的学费都供不上,所以往往年关一到,还买不起猪肉过不了年节。

一场伤心的事我上高一那年展开。那年年关,父亲李禄提着篮子,想去镇上赊点肉回来过年。按我们红安的风俗习惯,往往年关一到,拜年客便上门来了。无论多穷,此时是要烧冲肉给客人吃的。但最后,我父亲李禄哭丧着脸,在镇上转了一圈,拉下脸希望肉摊上赊点肉,但没有人理他。他只能提着空篮子回来了。他一回来,我母亲便哭。那时天空下着大雪,已经读了不少书开始学会思考的我,跑到堆满积雪的后山对着天空悄悄地哭,泪水流得满脸都是。那个冬天也因此成为我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一家人窝在家里不曾出门。那场大雪也因此一直成为我心里最大的一场雪,我躺在被窝里甚至不敢让哭声惊动我善良的母亲。还好,那个雪夜之中,村子里有几户人家还提着肉送到我家里来了。一位老人讲,“李光天在时,我们家的肉年年都是他挂到我家门上的啊”……从那之后,我知道了世间积德行善肯定会有好报的。因此,每当公与私、情与法在不停地搏斗的时刻,我便学会了知足。换今天另外一句流行的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曾祖父李光天,他死去多年,却还让我们享受了他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也从这些往事中,想象着李光天的光辉形象,盼望着穿越时空与他会面。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梦中给予过我任何暗示,仿佛这个人在本吴庄从不存在,也从未在我们家族中出现过。我父亲他们那一辈,除了干农活,很少有回忆往事的意思,回到家便往床上或凳子上一躺,呼噜声便像风一样刮起来了。

3

革命者李登高的父亲李有德跑到李光天这里诉苦的消息,在本吴庄传得很快。

“又要革命了!?”

“是啊,又要革命了!”

“天无宁日啊!”

“革命好啊,让我们的命重新来一次。”

村庄里的人七嘴八舌。

他们说李有德心里乱糟糟的。

李有德便坐在李光天的院子里，喝着茶，对我曾祖父说：“哥啊，向其他人诉苦未必有人会相信啊。”

我曾祖父李光天抽了一口水烟，点头说：“那是当然的，因为革命真是要杀头的。”

那时，黄安县里革命已经闹得很厉害。有诗为证：

小小黄安，
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
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
女将送饭。

说起革命，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家家户户都有。有时，甚至一个村庄，一家几代人扶老携幼参加革命。革命也是胶着战，打得很凶，死人很多。往往是共产党的队伍一走，国民党的部队便脚后跟进来了。再加上散落的乡团和山上藏着的土匪，村庄里的人头便经常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落地。

所以，那时我们的本吴庄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家兄弟几人，都在外面参军，有的是共产党有的却是国民党。这样做父亲的便很为难，共产党一来，问有参加国民党的没有？父亲不敢说没有。而国民党一来，又问有参加共产党的没有？父亲同样不敢说没有。

如此一来，许多家庭都知道自己年轻的儿子跑出去跟着拿枪的，却不知到底是哪一个党的哪一支队伍。我的舅姥爷周汝贵在新五师中原突围那年，队伍被打散，掉队后回到故乡，看到满路都是国民党的兵，他不得不换了套国民党的衣服还乡。但到村子里后，看到村子里人怀疑的目光，待上几天他便感觉不对劲，听说村子里有人告密，国民党有可能要来拿他——其实告密者无非是想得到他家的地产和房产罢了。我舅姥爷再牛，为了保命他便又在深夜里悄悄离开故乡逃走了。这一逃能到哪里去呢？新五师在李先念的带领下顺利冲了出去，我舅姥爷作为掉队的，在莽莽的丛林里想找到自己的组织，比登天还难，结果他只好跑到我们黄安的邻县麻城一个镇上，给一家地主打了四年的长工，直到解放后才敢溜回村子里来。命是保住了，但60年代末，人们翻起老账，说他曾参加国民党，不然当初不会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回来。他迅速被批斗，斗得实在受不了，便又出

去找组织。找了好几年,终于打听到当年新五师卫生部的有关领导还活着,而且就在湖北黄石市任现职,舅姥爷就穿得破衣大甩(黄安方言,衣服破旧走起来飘动的样子)的去敲门。那位领导看到我舅姥爷,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说,你还活着啊,我以为你早就没命了呢。他们的泪水就哗哗地流着。以往我总觉得哗哗这个词有些夸张,但那一刻是那樣的真实。在幸福的泪水流足之后,那位领导给我舅姥爷周汝贵开了证明,说他是自己的警卫员,舅姥爷这才捡了一条命,并且每个月还获得了十几块钱的生活补贴。我舅姥爷感动得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得以在村庄里立足,并生了一大群孝顺争气的儿女,过上了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时常看着这位善良的、脾气大的、爱喝高度白酒的老头想,如果那位领导没有活着,我舅姥爷也许就会像我爷爷那样天天想着怎么自杀。

这就是本吴庄周围的生活环境。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由不得自己随意选择。

小时我母亲便对我讲,她自己像我那么大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天天就是跑反。国民党来了跑,日本人来了跑,土匪来了跑,有时甚至连共产党来了也得跑。因为张国焘开始清除 AB 团了。

“十三四岁的伢子他们都敢杀啊。”我母亲说。那时,只要稍有文化的、思想的、识字的、爱说话的,大多被张国焘当作 AB 团分子执行枪决。可以想象,当一些细伢子被枪顶住脑袋,还没有彻底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自己就被“革命”了,这种痛苦犹如蝎子钻进喉咙,犹如蚂蟥挤进脑袋瓜子。

有思想绝不是一件好事。我母亲说。而我父亲对于我爱对着天空思考给予了极尽的讽刺。

在我们黄安,乡下人得出的结论是,凡是有思想的人,杀头挨打的几率比一般人可能性大。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所以后来我在机关搞文字材料,业余时间偶尔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时,我母亲总是高度紧张,生怕有一天我会被批斗;而我父亲,则时时对我一篇文章的稿费竟然比他辛辛苦苦一年种一块地的收入还高,始终感到怀疑。他觉得我的人生在投机取巧,这让他活得特别的不踏实。

许多年后我结婚生子,当母亲病逝离开这个让她悲苦一生的世界,有一年春节我父亲到北京来过年时,我对他说:“再找一个老伴过吧。”他非常诧异地看着我。好像看到当年见他就躲的那个孩子,脑子里竟有这样奇怪的想法。他果断地说了声“不”,便不理我。我们无言,便一起看录像。我喜欢看一些国外大片,DVD 片中偶尔有一些暴露的镜头出现时,我发现父亲就不自觉地将眼睛捂上,遇到有激情的环节,他便借机走了出去,避而不看,最后回来叹息一声。我问他为什么叹息,他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看的那些片子,过去可是要被抓的。”我听后不是想笑,而是突然想哭。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不像母亲那样显而易见。苍老下

去的父亲终于不再对我扬起拳头，对我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就是所谓的隔代亲吧。其实我儿子相当的叛逆，他身上延续着我的血统，从小便表现出了比我还要强烈的叛逆性格，比如刚学写字时，一般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却偏偏要从下到上，从右到左。我工作很忙，一天到晚在一个复杂的单位上班，从心智到身体，都累得要死，回到家还得应付他一天到晚那么多的为什么，简直火冒三丈，动不动把他的书给扔了。过去的知识早还给学校了，除了方程，我哪懂得列什么分步算式？换我小时，不打个半死身上也要有个遍体鳞伤。可我还算文明，知道儿子不能随便打。

因此，我怀疑从黄安县走出的人似乎都有个性。有些个性，已脱离了血统关系。

一个生动的例证是，被送出去读书的李登高，几年不见还乡，一回来竟然要革自己父亲李有德的命了，这个消息在村庄引起了轰动。

但轰动归轰动，革命始终未见动静。非暴力主义在我们那里并不流行，“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这个道理在大家见到死了那么多人后，被本吴庄人当作真理。

因此，在李登高还未彻底革命之前，他刚回来便被村里的团丁盯住了，他们晚上摸上门来抓李登高。

李有德拍着胸说：“这纯是谣言。”

团丁的头目陈无良长得清瘦，斜眼。因为不是本吴庄人，所以说话底气很硬。

“真的想回来革命的吗？”

“没有。”

“要抓自己的老子杀头？”

“没有。”

他们只好吃顿饭，揩把油便离开了。

这样倒真的安稳了一段时间。结果，本吴庄没闹，黄安县西北边的七里坪那边却先闹了起来。人们听说，一个叫王秀山的读书人，居然真的革了自己父亲的命，带人夜里回来烧了自家的房子。

王秀山的父亲是真正的地主恶霸，于是被农学会杀头了。

“真狠心啊，连自己的父亲也杀！”四乡八里的人一边在胆战心惊之时，一边慨叹。

他们终于见证了革命厉害。

但是，后来不知是什么人，又把革命者王秀山的脑袋壳砍掉了。李有德这才惊慌起来。但他仍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就会革自己的命。这是哪门子事呢。黄安还讲忠义孝道呢，连孝道都不讲，还叫人！